

影像中的符号建构与文化精神传播

——以电影中“黄河”“太行”“嵩山”符号作为考察对象

□李娟

【摘要】中国电影在表现黄河与家国情怀、文化想象、个体命运等方面,形成了一套独特的影像话语体系。这些影像对于“黄河”符号进行艺术化呈现,使民族文化品格释放出无限能量与魅力。以“太行”为代表的影像符码成为英雄叙事的重要载体,电影借助这些重要载体将文化品格内化为观众的心灵支点与归宿,并将其作为个体记忆印刻于精神世界,进而在集体记忆与社会记忆的范围中发挥影响力。“嵩山”的媒介叙事是借助影像形成的关于嵩山的文化记忆,是在文字、影像与实景等媒介中被书写的过程,同时也成为观众接受、阐释与理解的过程。电影在讲述故事的过程中,需要有意地将地理标识转化为民族文化符号,将民族的价值追求和文化品格融入其中。民族的文化精神某种程度上被蕴含在地理符号与文化符号之中,经由影像叙事传递中华民族的共同价值追求,从而使观众不断强化对于民族和国家的文化认同,并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坚定的精神力量。

【关键词】影像叙事;文化符号;地理空间;民族文化;艺术自觉

DOI:10.16017/j.cnki.xwahz.2023.10.014

符号作为一种集体记忆的载体,其信息的记录、建构、沉淀与凝结是一个相互渗透与交织的有机整体。文化符号是一个时空交织的多层次、多维度的文化共同体,而集体记忆在文化符号的建构、认同、传播等程序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中国电影往往通过叙事,借由文化地理空间呈现特有的影像话语符号,从而在人文地理与地域形象共生之中建构与传承特有的文化精神。本文选取蕴含“黄河”“太行”“嵩山”等地理空间与文化符号的电影作品,考察电影叙事与集体记忆、文化精神之间的联系,分析如何通过调整表意形态而形塑文化符号的媒介价值,以期勾勒影像叙事建构自身话语与文化记忆过程中的多维面向。

一、影像叙事中“黄河”符号的话语建构

黄河流域作为中华民族与中华文明的发源地,成为凝聚民族情感与文化记忆的纽带,黄河文化蕴含的文化品格是中华民族的精神之根与力量之源。中国电影中的“黄河”通过影像共享的意义结构,连接起接受主体与影像中的话语模式,延展历史与个体的镜像表达,让观众对影像中“黄河”产生主体意义的认同,从而完成文化记忆的跨时空传递与文化精神传承。例如,音乐纪录电影《大河唱》以音乐人苏阳为线索,以记录电影的写实镜头呈现了陕北说书人、秦腔剧团团长、花儿歌手和皮影艺人等人物的

生活状态,用中国艺人的故事展示时代的变迁,探究传统与当下交织中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问题。电影中的花儿、皮影戏、秦腔、说书、唢呐、面人、糖人等民俗符号,讲述颇具人文气质的中国故事,引发观众探寻传统文化的过去、现在与未来。“黄河”作为一种文化符号的时空切片进行呈现,通过音乐与情感的共振和冲突,“黄河”在不同时间与空间的走向,达到历史与现实的重叠与呼应。电影《黄土地》则以色彩作为主基调进行叙事,黄土地与黄河水在相互映衬中建构了蕴含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基因的世界。作为文化符号的表象征征,黄土地与黄河水在影像构建的文化属性中以集体记忆的方式呈现,参与建构了民族文化形态共融共生的生态体系。黄土地与黄河水象征着古老民族蕴藏的巨大生命力与包容性,同时也象征着传统的固守与封印。影像中的“人”在“天”“地”“水”意象中传递出凝重的生命意识,表达着小人物对于命运的不屈与抗争。“黄河”作为空间背景与意象能指,被放置于地理景观与精神心灵的双重空间之中,带给观众的是人类对于命运改变的希望、对于民族精神回归的渴望、对于冲破压抑人性的希望,在两种空间交互中重建关于“黄河”的文化记忆与叙事美学。

中国电影符号媒介对民族文化的表征,往往通过多维度、多视角且融入故事的生成及建构过程,以解决文化传统与现代阐释对接与融合等问题。约翰·费斯克认为:“组织化的象征活动与典礼活动,用

以界定和表现特殊的时刻、事件或变化所包含的社会与文化意味。”^[1]仪式注重对于社会精神与文化意味的反映,往往建立在文化思维基础上并通过象征类比的推理模式,寄托特殊的精神信仰。电影《黄河绝恋》中镜头掠过奔腾不息的滚滚黄河,女性博大而柔美的臂膀与气势雄伟的母亲河,经由影像话语逐渐转化为一种文化记忆,更在观众心目中逐渐沉淀为文化的力量。电影中的“黄河”作为文化符号的生成结果,主要依靠“文本”符号与“空间”语境进行同构,这种因素往往成为参与建构“认同”的力量。以符号表征文化传统与审美意象之间的关系,以及民族性与现代性之间的关系等问题,同样成为中国电影叙事主题内容之一。

中国电影在表现黄河与家国情怀、文化想象、个体命运等方面,形成了一套独特的影像话语,通过对“黄河”符号的艺术呈现,使得文化品格释放出无限的能量与魅力。黄河作为一种自然景观与地域空间,在电影中并非仅仅作为时代、地理与视觉背景而存在,作为审美观照对象的黄河往往植入了理想、道德、伦理与政治等元素,从而使得“黄河”被赋予更多自然、文化、历史、社会等层面的符号意义,成为民族、国家、社会、个体发生转型与变化的艺术具象表达与历史见证。音乐电影《黄河大合唱》以“黄河”作为音乐符号,其中的“河”与“人”相互映衬,音乐与影像交相呼应,展现了中华民族不屈不挠的抗战意志。“黄河”文化符号借助影像话语,被赋予了古老、文明、活力、包容、伟大、英勇等价值意蕴,成为中国精神的重要象征。

二、英雄叙事中“太行”符号的文化认同

在人类自身的成长过程中,个体的记忆受到社会历史文化背景的影响,而历史事件与文艺作品成为建构个体记忆的重要内容。法国社会学家涂尔干认为,共同回忆创造了一种凝聚感,形成“集体意识”能为共同体找到一种方式描述他们自己的事实^[2]。太行山与中国历史发展紧密相连,见证了革命事业的发展,成为革命战争年代的重要战略地区,“太行”参与形成了延续中国精神血脉的集体记忆。电影《地道战》承载了几代中国人的集体记忆,“太行”成为一种传递英雄主义的文化符号,以太行山区为中心的区域也成为凝聚英雄主义的热土。电影《浴血太行》讲述了抗战爆发以后,太行山人民坚持敌后游击战的故事,“太行”作为文化符号,再次传递了中华民族品格中的正义、担当与血性,彰显了中华儿女在国家和

民族生死存亡之际的高尚意志品格。

集体记忆是特定社会群体成员共同经历的过程和结果,大量个体记忆与集体记忆可以通过代代相传,形成并保存共同的社会记忆。哈布瓦赫尤其强调当下性,认为“往事”并非客观事实,而是等那件事过了之后,在社会中不断地更新重组后建构的^[3]。记忆不仅代表共同经历事件的过程与历史,还包含形成记忆者背后的观念与心理。太行精神是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图谱,对于太行精神的传承,很大程度上来源于文艺作品带来的文化记忆。电影《太行山上》讲述了朱德总司令率领八路军主力东渡黄河挺进抗日前线,建立太行山根据地的历程,“太行”作为文化符号,也在艺术接受中逐渐成为一种精神符号。在中国电影中,“太行”更多与英勇的抗战历史相联系,传递出中华儿女的革命气概。以“太行”为代表的影像符号成为英雄叙事的重要载体,将民族精神内化为观众的心灵支点与归宿,在集体记忆与社会记忆的范围中发挥影响力。文化符号的建构也是一种表达的权力,这种权力并不单单存在于理念与价值的建构力量之中,更多地存在于符号的认同与社会结构之间的关系中,存在于对精神符号的建构与接受者之间的特定关系中,通过这种关系得到界定,并在符号生产与场域结构中得到认同与传播。

21世纪以来,中国电影出现了一大批塑造英雄、讴歌英雄的优秀作品,影像话语成为国家话语的重要组成部分。而电影中英雄叙事的发展流变,也折射出不同历史时期的文化思潮与社会心态,在电影文本与话语系统中,更具直接的内在关联性,其中以太行山作为背景元素的电影作品,更是诠释了不同历史阶段的“英雄”内涵。同时通过文艺形式,以文化记忆的方式对国家正史进行影像化表述,唤起观众心中的文化认同,进而增强民族情感和归属意识。20世纪70年代纪录电影《红旗渠》参与了一代人集体记忆的形成,红旗渠精神是太行山上永不磨灭的精神丰碑,成为中国精神谱系的重要篇章,体现了中华民族最优秀的精神品格。“太行”作为影像话语与文化符号,也带领观众经历了从民族危机、国家振兴到地域发展的不同历史阶段,“八百里太行”从地域空间视点中的英雄故事,逐渐拓展至民族命运与历史变革的大视野之中。

英雄叙事是对参与人类集体记忆的建构与价值视点的聚焦,指向人类更高的精神共性与命运走势。在更深层的文化诉求层面,则试图通过英雄话语有效缝合个体与集体、时代与民族之间的关系,更加清晰个体是“大写历史”的积极参与者。电影《李保国》

讲述了“当代愚公”带领群众脱贫攻坚的故事,电影中“自古燕赵多壮士,从来太行出英雄”的感喟,塑造了当代“太行之子”的英雄群像。中国电影需要将故事放置于社会语境与个体认知、情感和行动之间的互动之中,探索适合代际变化与文化消费需求的本土叙事策略,传递微观符号与宏观话语会通合一的内涵意蕴,从而实现把握时代脉搏、讴歌时代精神,激活文艺作品内部生机与活力。

三、媒介叙事中“嵩山”符号的记忆重构

电影在建构记忆与传递价值层面具有媒介的特性,往往在文本信息采集的基础上,进行艺术加工与形象传播,进而演化为社会记忆存续的载体。通过电影进行的媒介记忆,使社会历史文化事件或与之相关联的人物得以重现原型,并逐步内化为个人记忆、集体记忆和社会记忆。中国电影对于“嵩山”符号建构形成的媒介记忆,在实现历史与现实的媒介连接中,呈现出约定俗成的文化符号,并在媒介叙事的符号信息重复中,逐渐形成了对民族文化的认同。主要表现在各种以“少林寺”为背景的武侠功夫电影的传播与影响,“嵩山”也由此在影像文本中被赋予了功夫、禅宗、侠义等元素与意蕴。电影《少林寺》《南北少林》《少林小子》《少林俗家弟子》《木棉袈裟》等,对少林寺的故事讲述与刻画十分详尽。“嵩山”因少林寺的影响而成为宗教、哲学、旅游、武术、建筑、养生等领域的关注热点,电影借助叙事结构与“少林”“嵩山”等隐喻象征进行编码,成为通过媒介重构文化记忆的过程。对于记忆共同体的建构而言,媒介关于“嵩山”的记忆会突破时间和空间叙事的局限,成为在阐释记忆共时表征和历史传承时需要选择的一种视角。

“嵩山”的媒介叙事是借助影像形成的关于嵩山的文化记忆,是在文字、影像与实景等媒介中被书写的过程,同时也成为观众接受、阐释与理解的过程。媒介叙事是在双重框架之下被创作者重构而成的,对于“嵩山”叙事的媒介记忆,本质上也是相关影像文本的叙事过程。20世纪80年代经典电影《少林寺》创下中国电影史上观影人数和票房收入的奇迹,成为中国电影史上的重要现象,并对推动中国功夫文化的对外传播具有较强影响力。《少林寺》中匡扶正义、杀富济贫、反抗欺压的武侠精神,很大程度上满足了观众对于“英雄”的想象;影像中的苍松翠柏与千年古刹等自然景观,为“嵩山”赋予了神秘、正义、雄伟的气质,自然被作为英雄形象的艺术化典型。

“嵩山”不仅拥有钟灵毓秀的自然风光美景,还有快意恩仇的江湖传奇故事,成为英雄们成长的地方,并逐渐由媒介叙事沉淀为一代人的集体记忆,参与构建中华民族文化共同体的心理与情感世界。“记忆不断经历着重构。过去在记忆中不能保留其本来面目,持续向前的当下生产出不断变化的参照框架,过去在此框架中被不断重新组织。即使是新的东西,也只能以被重构的过去的形式出现。”^[4]对于“嵩山”的集体记忆成为影像生产的共同体意识与价值观念,成为功夫文化价值的直接凝结和体现,成为特定社会群体成员共享和经历的结果,而与“嵩山”相关的电影也成为群体意识延续与提取记忆的文本。

人类的文化形态与文化内容大多是记忆的产物。在文化形态之中有相当一部分是记忆的构成物,解释文化现象与文化特征可以从记忆理论开始,同时借助符号的角度探寻文化记忆的内在规律,使其成为了解文化形态的方法与视角。卡西尔说:“应当把人定义为符号的动物来取代把人定义为理性的动物。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指明人的独特之处,也才能理解对人开放的新路——通向文化之路。”^[5]中国电影以其内在的历史重构模式促成了文化记忆的特殊形式,其通过影像中的文化记忆,不断加强观众对于文化符号的集体认知。以“少林”为主题的电影叙事聚焦于中国功夫背后的文化精神,将传统的历史文化符号转换成为新的精神符号,参与建构集体文化记忆。电影《新少林寺》成为对“嵩山”符号建构的又一部重要影像,它讲述了军阀混战年代少林英雄救国救民的故事,以“禅”“武”作为重要符号元素,奠定了空灵的叙事美学基调,以唤醒观众的清净心和慈悲心。电影对于“嵩山”符号的建构更多通过“禅宗”的文化意象进行,某种程度上也传递了中国传统文化中“觉悟本心”的最高智慧。

民族精神符号在历史长河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尤其在孕育孵化维系社会及人类不断发展进步的文化基因方面,发挥着不言而喻的作用。“嵩山”符号已经成为很多中国人的集体记忆,更多与“少林”“禅宗”“功夫”等价值内涵相联系,成为文化记忆的重要内容与类型,也成为一种典型的“记忆场”。当“影像—符号”通过电影叙事与符号象征意义进行合成呈现时,“嵩山”的符号意象更多地成为“记忆场”中的重要因子,转化为影像话语系统中的媒介符码。观众在接受“嵩山”文化符码的过程中,通过影像语言与影像符号进行新的意义重构,并在其过程中不断回忆历史时空中的故事,重构他们与过去的关系,根

据已出现的记忆场重新反观并定位自己。由此,“嵩山”符号作为文化记忆是通过影像表征形式建构出来的,影像与符号借助现实表象的特性进入电影,并形成了记忆之所与记忆之场。电影作为大众媒介的一种,在集体记忆的建构过程中起到重要作用,同时也成为一种媒介记忆现象,为集体记忆与社会记忆的建构与研究,提供了新的场域与视角。

四、影像符号中的文化精神传播

符号往往是针对历史有选择的沉淀与构建,如果一个民族缺乏共同的文化符号,往往会缺乏共同的精神基础与情感基础,缺乏构筑想象共同体的文化根基。影像话语的建构对于民族自豪感、个体身份归属感、文化认同感等,均具有重要作用,而民族文化符号建构的过程,往往也是自我身份认同的过程。中国电影通过“黄河”“太行”“嵩山”等空间地理符号切入,对民族文化及精神品格进行观照与传播,会有力改变传统的、以时间为固定维度的片面叙事场景,还原时空交融的立体化电影美学及其生态景观。对于电影自然空间符号与精神特质的考察,可以更好地把握电影叙事规律,进而建构集基础性、前沿性与探索性于一体的电影叙事模式。

地理空间不仅提供了客观的地理位置和空间场域,更成为传递文化精神的重要载体。地理景观具有时空统一属性,作为空间性的地理景观与地理标识,为空间性景观呈现无形的时间提供了可能性。民族文化符号是经过漫长的历史沉淀之后,留下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凝结物,是一个民族时空、历史信息与民族品格的体现。中国电影要积极探索以地理标识参与民族文化符号建构的视角,推动“黄河”“太行”“嵩山”等地理文化符号参与建构起集体记忆,在历时性与共时性相结合的维度上,讲述个体的命运与民族的奋斗史与成长史。中国电影需要加强地理标识向民族文化符号的转化,在讲述故事的过程中,将本民族的价值追求和精神意蕴融入其中,强化对于民族和国家的文化认同,并为中华民族找到坚定的精神力量。将地理标识转化为文化符号成为中华民族感知世界的独特方式,观众在接受影像叙事的过程中建构更加具体化、形象化、整体化的思维模式,在建构文化符号中不断生成更多意义,以新的创造传播中华民族独特的价值取向和审美精神。

以影像和声音为主要媒介载体的电影,通过自身特质进行艺术叙事,营造了一种促进集体记忆形式的历史氛围,某种程度上消弭了时间与空间带来

的距离感,能够使观众进行“浸入”式的个体记忆建构。电影中的“黄河”“太行”“嵩山”故事,大多展示了生命形态内在的丰富性和多元性,以不同的“在地”经验提供关于民族的想象与文化品格的阐释。文化符号借助影像语言,逐渐形成了集体记忆且参与民族文化心理的形成,对于加强自我认同、民族认同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中国电影的创作者需要深入挖掘、呈现、传播民族文化精髓,探索完成家国叙事和个体叙事之间的缝合,使其在纵向的历史维度与横向的空间维度中,更好地传承中华民族的历史记忆、文化智慧与精神特质,从而维系中华文明之根,寄托中华各族儿女的精神诉求。

民族文化精神作为中国精神的重要内容,成为推动民族进步的重要力量。民族文化精神是整个民族在不断实践中形成的民族文化符号、文化品格、文化心理、文化性格的综合体现,是民族意识、文化与价值理念的彰显,这些品格特征与思想意识共同凝聚成为中华民族的精神特质。电影作为重要的艺术样态,需要在文化观念、创作理论、文艺批评等层面坚持艺术自觉,使电影在传递情感和精神力量的背后,在叙事维度寻找到合适的支撑点与落脚点,有效彰显中国故事的深度与广度。电影中的“黄河”“太行”“嵩山”等符号,成为借助电影叙事与中国传统的艺术意象结合的探索,也成为电影表达民族品格的积极艺术探索。艺术自觉与民族文化的历史起源、价值取向、品格特征等要素密切相关,能够体现出民族文化发展的内在逻辑与基本趋势。中国电影需要进一步加强理论自觉与创作自觉,以中华文化逻辑的重要维度体现民族文化深层结构,在电影叙事中发挥文化引领与支撑作用,积极推动中国精神的传承与弘扬。

[基金项目:2022年度河南兴文化工程研究专项项目“文艺精品力作讲好中国故事的河南实践研究”(2022XWH072)阶段性成果]

参考文献:

- [1]约翰·费斯克.关键概念:传播与文化研究辞典[M].李彬,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03:243.
- [2]莫里斯·哈布瓦赫.论集体记忆[M].毕然,郭金华,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248.
- [3]周海燕.媒介与集体记忆研究:检讨与反思[J].新闻与传播研究,2014(9).
- [4]扬·阿斯曼.文化记忆:早期高级文化中的文字、回忆和政治身份[M].金寿福,黄晓晨,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35.
- [5]恩斯特·卡西尔.人论[M].甘阳,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34.

作者简介:李娟,河南省社会科学院中原文化研究杂志社社长、研究员(郑州 451464)。

编校:张如铁